

※「二十一世紀的漢學對話」專輯※

如何瞭解「漢學家」——以普實克為例

陳國球*

眾所周知，現今學界所謂「漢學家」，是“Sinologists”一詞的中譯。這是西方對從事有關「中國」研究的學者的統稱。這個稱謂在過去（尤其是二十世紀以前）定位相當清晰，因為對西方學者而言，有關中國的種種學問，與西方的知識世界有相當的距離，故可以劃成一角，供少數專家用心鑽研。然而，至今文化認同歷經散聚游移、學術範式不斷拆解整合；此際要追問何謂「漢學家」？或者會帶來有趣的思考。為了寫這篇短文，我曾向一位從牛津大學過來的同事提問，他的答案是：「漢學家」是學養精深、見聞廣博的中國學問研究者，如牛津大學的龍彼得 (Pier van der Loon, 1920-2002) 教授，毫無疑問就是其中一位卓越的代表；至於他本人業師伊懋可 (Mark Elvin) 教授卻只會自許為專長於「中國史」的「歷史學家」，而非漢學家。如果這個說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話，「漢學家」在歐洲學界中已日漸退隱於「昔日的黃金歲月」。不過，當我把同一問題向我校幾位研究生提出時，他們腦海中「漢學家」的形象重點卻由研究課題轉移到從事研究者的國族身分之上，「漢學家」之前即使沒有加上「西方」、「日本」等限定語，這些學者和他們的成果都屬於「海外」或者「境外」的。這種理解相信是現今大部分中國學者所共有的。

所以說，在西方「漢學」之成立，原是為了區劃出一個特殊的研究範圍；是西方對異地文化或者文明的一種考察，其考察方式與西方固有的學科分門如經典學、哲學、語文學等，可以互不統攝。例如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還見到漢學家約翰波普 (John A. Pope) 有這樣的主張：「一般的」藝術史專家並不能勝任屬於「漢學」範

* 陳國球，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圍的中國藝術研究¹。不過這種切割，隨著現代學科知識的膨脹繁衍和文化的交叉錯雜，已日益困難；於是昔日自成一角卻又包容廣泛的「漢學」，就漸向黃昏了。我們只要對照蕭公權於不到二十年後在美國發表的〈中國研究與專業學科〉²的觀點，就可以見到這個趨勢。今天可能還有空間範圍相類似、但更偏重當代情勢的「地區學」(area studies)，然而不少優秀的西方學者卻積極在不同的專業範圍（如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或者比較文學）與中國主題以外的同行交流對話，在西方學術主流中謀求應有的席次。回到中國的學術環境，「漢學」既以從事者的國族與文化背景為界劃原則，一經圈定，中國學者就有與「外國」漢學家在同一學術領域中比較競技的假想。由此又衍生了「中國強還是外國強」這種從「民族大義」出發的心結。上世紀三十年代陳垣、陳寅恪、胡適、傅斯年等討論「甚麼時候『漢學』中心才能搬回中國北平」，大抵就是源自這種競賽心理。

正如上述，當今的「海外漢學家」不外是各種學門中以中國為主題的專家學人。和中國境內從事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思想等研究的人員一樣，當中自有高下良莠，很難一概而論。對海外漢學成績的認知，不妨博聞多識，保持開放的態度，以其個別的學術成果為主要根據。如果某位外地學者對《水滸傳》的繁簡本問題梳理得比前人都清晰有據、對魯迅的幽暗意識有更深刻的發掘，我們都應該尊重、應該細參，如同尊重國內傑出的《水滸》和魯迅專家一樣。

我們說要關心具體的學術成果，但也不應把學術僅僅視為知識的生產或者貿易。我一直相信，學問到深處，必然會與生命相交感。「海外漢學家」為何自遠方來遊？其間的因緣和合，其人的心路歷程，其實都很值得我們探問。就以陳平原教授提到的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為例，他和夏志清就夏著《現代中國小說史》的言論交鋒可說是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上一次重要事件。照李歐梵的描述，在不少美國學生眼中，夏志清的人文主義文學批評似乎比普實克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文學主張更得人心。事實上，作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里程碑人物，兩位先生的文學見解及其文化資源都有可供今日借鏡和反思之處。如果以

¹ John A. Pope, "Sinology or Art History," (〈漢學或藝術史〉)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3/4 (1947): 388-417.

² Kung-Chuan Hsiao,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1964): 112-114.

二人的學風和關顧面而論，則夏氏的學術貢獻應該屬於美國二十世紀中葉以還所開展出來的「中國研究」類型，而普實克更接近歐洲傳統的漢學體系，卻又能煥發規模，推動漢學向前邁步。現在我們最常見的普實克著作是李歐梵編選的《抒情的與史詩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³，因此對他的現代文學研究成績會比較熟悉；另一本英文加法文的著作《中國歷史與文學》⁴因為沒有中譯，中文學界注意較少，但在西方漢學界卻早負盛名，雖然柳存仁曾對書中一些疏誤作過苛評，但學界還是非常尊重他在話本小說、蒲松齡，和劉鶚《老殘遊記》等研究的貢獻。現在，普實克以捷克文撰寫，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中國：我的姐妹》(*Sestra moje Čína*)，其中、英文譯本都已面世⁵。我們可以透過這位友善而充滿好奇心的漢學家寫出的中國遊記，瞭解他如何修訂自己的學術航道。

普實克在捷克查理斯大學修讀的是古希臘、拜占庭與羅馬帝國的歷史。始於古史，再經由「近東」，他的研究興趣開始移到中國。這漸次開發的目光，應是源於一種探索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現象的渴望。得到當時正在中國開拓市場的捷克鞋業公司的資助，普實克正式開展了他的漢學研究，先後到瑞典和德國研習，寫成有關先秦北狄民族的論文。然後他毅然隻身赴遠東研究中國經濟史。從一九三二年開始，他在中國居住了兩年，然後到日本繼續研究。《中國：我的姐妹》一書就是他回捷克以後所寫的中國回憶錄。在華期間，他和各種不同階層、不同地區的中國人來往，親身體會這遠國的語言鮮活，於是他更傾心於中國的口語文學傳統，留意白話文運動以來的新文學。書中更描寫了他與徐志摩、胡適、鄭振鐸、冰心、丁玲、沈從文等人的交往。這些因緣，應該可以說明他後來大力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背景。在此以前，中國的「新文學」從來沒有進占過漢學舞臺的前方。中國之行，讓普實克揭開了這新的一頁。

普實克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一是他的結構主義的思維方式，表現在他對文學運動以至文學作品的系統式結構理解；另一是他對現代文

³ Jaroslav Průš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1987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⁴ Jaroslav Průšek,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1970).

⁵ 中譯：《中國：我的姐妹》（北京：外語教學研究出版社，2005年）；英譯：《My Sister China》(Prague: The Karolinum Press, 2002)。

學的精神意蘊的體會，這以〈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一文最有代表性。李歐梵以「抒情的」和「史詩的」兩個概念去綜括普實克的現代文學研究；我以為「史詩的」一語指向他結構主義思維的敘事傾向，而「抒情的」一詞則顯示了他與中國文學的默契知音。

「抒情精神」(lyricism)是現代的中國文學研究一個重要概念，普實克可說是這個概念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另一位奠基人是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陳世驥，同樣是重要的海外中國研究學者）。要理解這個創獲的來由，除了直接歸因於普實克個人的敏慧和學養、以至他對中國文化的深識之外，其實還可以進一步考慮普實克思維的文化脈絡。自世紀末以來，尤其經歷歐戰之後，西方世界瀰漫著消沉的情緒，一時間東方的精神智慧看來好像大海上的航標。位處中歐的捷克地區，開始承納中國的詩性文化。早在一八九七年，博學多才的東方學家德沃夏克 (Rudolf Dvořák, 1860-1920) 和捷克民族主義詩人符爾赫列支奇 (Jaroslav Vrchlický, 1853-1912) 聯手把《詩經》譯成捷克文，認為這是世界最好的抒情詩之一。其後，另一位捷克詩人馬提修斯 (Bohumil Mathesius, 1888-1952) 從一九二五年開始以捷克文譯寫了不少中國古代詩歌。一九三七年普實克從遠東回國後，以他的漢學知識結合馬提修斯的語感和韻律，兩人陸續完成了多種在捷克當代文化有深遠影響的漢詩讀本。即使在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淪陷於納粹德軍的黑暗歲月，不少捷克人的懷中響起遠方的歌聲——杜甫〈兵車行〉與之同憂戚，李白的〈月下獨酌〉與之同寂寞。正如普實克在詩集後記所說，捷克人讀這些詩時實實在在地感應到古代中國詩人向他們說話。我們想想，這位愛讀韋莊〈荷葉杯〉「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⁶的普實克，對中國的抒情傳統會是多麼地嚮往。

事實上，如果把視野再進一步擴展，我們更可以將這種對中國抒情傳統的傾慕意識溯源到十八世紀末捷克民族復興運動以來的波希米亞浪漫精神。從以馬哈 (Karel Hynek Mácha, 1810-1836) 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到二、三十年代的「捷克詩性主義」(Czech Poetism)，捷克民族精神的召喚就與抒情空間的探索並存。因此，當普實克從中歐在地的觀點出發，會注意到歐戰以來西方文藝種種「前衛運動」中其實洋溢著一種「抒情精神」，更意會到這種文化思潮與遠東中國文學精神的冥合。這些思慮，又自然會引領他對中國新文學作同一方向的觀察，特別究心於新文學作

⁶ 見普實克：《中國：我的姐妹》，頁 415。

品中「抒情的」元素如何突破「史詩的」框套⁷。當各種因素匯聚於普實克身上時，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路向也就應運而生。

以上對普實克治學歷程及其背景的梳理固然不算詳細周密，但大概可以說明我的一些想法：面對紛至沓來的「漢學」成品，我們固然要具備判斷能力，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而，我們若要充分領受「海外漢學家」的創獲，也需要有開闊的胸懷，最好還能探索其學問的根源，體察其文心。為文論學，貴乎知音；而心照神交之餘，更可以進一步反躬，省思自己的短長優缺。比方說，何以普實克在熱心支援中國史詩式革命寫實的同時，還能感應到「新文學」中的抒情精神？為甚麼中國的現代文學史敘述會對這固有的抒情精神如此冷漠甚至恐懼？這些方向的思慮，或者可以有助我們鑑遠知今，從而更清醒地往前邁步。

⁷ 參考 Jaroslav Průšek, “A Confrontation of Traditional Oriental Literature with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pp. 82-84。